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JingJi NiuQu Yu PoHuaiXing ChuangZao

经济扭曲与“破坏性创造”

韩忠亮◎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JingJi NiuQu Yu PoHuaiXing ChuangZao

经济扭曲与“破坏性创造”

韩忠亮◎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扭曲与“破坏性创造”/韩忠亮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ISBN 978-7-5068-3448-3

I. ①经… II. ①韩… III. ①中国经济—转型经济—研究 IV. ①F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7589 号

责任编辑/ 刘 路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448-3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难题——破坏性创造的“增长陷阱”	1
二、中国奇迹的“光”与“影”	3
三、工业化战略、政府干预与经济赶超	7
四、创新、适宜制度与经济收敛	9
五、体制性扭曲：中国的“超比较优势战略”	10
六、“破坏性创造”：成本转嫁及成本转嫁下的经济增长路径	12
七、中国经济增长：从“破坏性创造”到“创造性破坏”	14
八、本书为读者呈现了什么？	15

第一篇 经济扭曲与“破坏性创造”内生增长模型

第一章 经济扭曲及扭曲经济中的增长	20
第一节 市场不完善下的内生性扭曲	20
第二节 工业化战略与政策性扭曲	30
第三节 经济转型与中国的体制性扭曲	35

第二章 熊彼特增长理论与“破坏性创造”	42
第一节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与内生经济增长	42
第二节 经济扭曲与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扩展	51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扭曲与“破坏性创造”效应	56
第三章 “破坏性创造”:一个基于“成本转嫁”的内生增长模型	64
第一节 转型中国的经济扭曲	64
第二节 “破坏性创造”效应:“成本转嫁”模型	69
第三节 基于“成本转嫁”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81

第二篇 经济扭曲的创造性效应

第四章 扭曲“创造”了出口与经济增长	92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与扭曲	92
第二节 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扩张	98
第三节 对外贸易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106
第五章 扭曲“创造”了高投资与高增长	115
第一节 高投资与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	115
第二节 体制性扭曲与中国的“高投资”	124
第三节 高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133
第六章 扭曲“创造”了非创新型技术进步	139
第一节 后发优势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	139
第二节 制度、政策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	147
第三节 贸易、FDI 与中国的技术进步	151

第三篇 经济扭曲的“破坏性”效应

第七章 经济扭曲加剧中国的“贫困化增长”	162
第一节 经济扭曲加剧了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162
第二节 中国出口“增量不增利”效应	168
第三节 劳动力的贫困化与内需不足	177
第八章 经济扭曲形成资源与环境的悲剧化	191
第一节 经济扭曲与资源、环境问题	191
第二节 工业化与中国的资源、环境悲剧化	204
第三节 全球化与中国资源与环境的悲剧化	213
第九章 经济扭曲“破坏”了创新机制	218
第一节 教育和科研机制的扭曲	218
第二节 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	222
第三节 研发的“挤出”效应	228

结论篇

第十章 从“破坏性创造”到“创造性破坏”	240
第一节 打破“破坏性创造”模式——技术进步	240
第二节 强化以吸收模仿为主导的技术升级	250
第三节 从吸收模仿到自主创新	255
参考文献	264

导 论

东亚“奇迹”中都有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记录,而中国“追平纪录这个事实引出了一个质疑:别国高速增长,都收获了一个果实,即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了市场化,完成了城市化,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了准发达国家。而我国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却突然发现离真正的工业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刘伟,2008)。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成功地实现了增长“奇迹”,却离真正的工业化还很遥远,尚未内生地走向自主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提出了“破坏性创造”的概念,并将其引入由“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所驱动的熊彼特(Schumpeter)内生增长模型,根据经济扭曲时企业技术升级的最优决策行为,建立了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即一个关于“破坏性创造”的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成本转嫁”“破坏性创造”和“超比较优势战略”,来刻画中国在经济扭曲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模式。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难题——破坏性创造的“增长陷阱”

将分析贸易效应的“成本转嫁”模型(韩忠亮,2011)引入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难题,即“创造性”与“破坏性”效应并存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通过“破坏性”产生的“创造性效应”,形成了“破坏性创造”的过程。这一“破坏性创造”的效应表明,由于资源配置的扭曲激励企业将

部分私人成本转嫁给社会,由此放大了中国产品“事前”的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使生产和出口得以扩张,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上低成本的过度竞争。因而是说,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在各种扭曲的影响下,实际推行的是一种“超比较优势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必然导致企业的“成本转嫁”行为,成本转嫁一方面促进生产与出口扩张,驱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创造性”效应;另一方面,转嫁到社会的成本形成了社会损失,导致“破坏性”效应。显然,在“超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现行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极具“破坏性”的“创造”之路,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即“创新性创造”过程的“反向操作”——不是通过创新,而是通过经济扭曲来“创造”经济增长。至此,“成本转嫁”“破坏性创造”与“超比较优势战略”三个概念和模型,刻画出了中国在经济扭曲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验和实证表明,“破坏性创造”非但未能向“创造性破坏”这一动态参照系收敛,相反,这一“创造”过程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使自主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内生实现。

“超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创造性”效应体现在:增强了中国在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出口大规模扩张,并通过增加就业、引致投资和提升技术水平等效应推动经济增长;促进中国数轮的投资热潮,从投资需求和投资供给两个方面都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超比较优势战略”下的出口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工贸易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技术水平;这一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破坏性”效应体现为,经济扭曲导致劳动力收入长期维持低水平,形成简单劳动力的贫困化,加剧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和内需不足的状况;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又会导致生产要素的过度投入和资源与环境的悲剧化;而技术进步被锁定在经验积累模式上使得中国的创新机制难以形成,技术进步缓慢。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破坏性”。

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内核集中反映在熊彼特(Schumpeter, 1942)的创新思想上。包含技术、产品、市场、资源配置和组织在内的所谓创新,具有“创造性破坏”特质,其“创造性”的长驱直入“不断地使经济结构从内部发生革命,不断地摧毁旧的经济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结构,”而推动了经济增长。Aghion 和 Howitt(1992, 1998)将熊彼特的创新思想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构建了熊彼特增长理论。该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特质的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

力。在 Acemoglu、Aghion 和 Zilibotti (2006) 的熊彼特内生增长与收敛模型中,一国的制度能够影响到企业技术升级的最优决策,进而影响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最优路径。中国在“超比较优势战略”下,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环境将影响企业的技术升级决策。当劳动力价格低于其边际收益产品时,意味着企业通过选择扩大规模、提高干中学效应来模仿和吸收先进技术,就可以获得额外的租金。因而,在更大范围内,企业技术升级的最优决策是模仿与吸收,而不是自主创新。对于技术水平与先进国家差距较大的工业化早期的中国来说,企业的这种最优决策恰恰是国家的最优增长路径,因而制度约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创造性”效应;但是由于迟迟不能向自主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转型,当中国的技术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企业的最优决策就不再是中国的最优增长路径,这就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破坏性”。这样中国经济增长在“创造性”和“破坏性”之间就存在一个困境——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却离工业化的距离还很远,还未能内生地走向自主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困境,即“增长陷阱”,这也是本书建立的理论模型所要解决的中国经济增长难题。

本书的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奇迹”,却未能内生地走向自主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问题,其内在机理的逻辑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到了体制扭曲的约束。只有建立自主创新机制的“适宜”制度,通过“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过程驱动经济增长,才能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与长期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收敛。

本书的研究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与出路提供了理论参照。

二、中国奇迹的“光”与“影”

中国“奇迹”源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深入的改革,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到中西部渐次推进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78 年~2010 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了 10% 左右,远远高于世界经济 3%~4% 的平均水平。2010 年,中国 GDP 达到 5.88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5.46 万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 中国人均 GDP 在 90 年代初只有 300 多美元,2001 年上升到 1042 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之列。2010 年达到 4430 美元,进入了偏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② 中国以 13 亿人口之众在下中等收入阶段只停留了 9 年,短于韩国(11 年)和平均 20 年左右的非新兴工业国(巴西 20 年、墨西哥 18 年、泰国 20 年、马来西亚 20 年),稍长于香港(8 年)、新加坡(8 年)和日本(7 年)。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势头始终较为强劲。2001 年加入 WTO 后,对外贸易更是急速扩张,货物出口规模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逐年上升。根据 WTO 统计,2007 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国。2009 年货物贸易出口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出口结构也不断升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由 1980 年的 65.2% 升至 2010 年的 94.8%。出口的爆炸性增长通过增加就业、加速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扩张。

高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驾马车。自 1978 年起,中国经历了数次投资热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达 20% 以上。尤其是 21 世纪后,从 2003 年至 2010 年,投资增速年均高达 26.1%。^③ 快速增长的投资无论从投资需求、投资供给还是从投资结构的层面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资本需求对 GDP 的贡献率在 1978 年~1992 年间为 30.1%,1993 年~2007 年间为 43.4%,在后危机时代(2008 年~2010 年)更是高达 64.3%。

此外,教育和研发的投入、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都极大地推进了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依靠低成本的优势,通过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投入的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实现的。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先富”走向“共富”的关键时期,国内市场、资源和环境问题日渐突出。

① 根据 IMF 数据库 2011 年 4 月 11 日发布。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1》。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 8 月的最新标准,中等收入国家指的是人均收入 996 美元~12195 美元,其中“偏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人均收入 3946 美元~12195 美元。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相关数据计算。

中国通过低成本不断扩大产出和出口的同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对外贸易的比较收益长期呈下降趋势。家电、纺织、鞋、玩具等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大宗商品,由于企业长期采取“以低价占领市场”的出口策略,出口价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少。贸易条件的不断下降减弱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收益。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利润率非常微薄。如在珠三角加工的一件国际名牌衬衫 Hugo Boss,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零售价是 120 美元,其中各级经销商和品牌拥有者赚了 108 美元(占 90%),接受订单生产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了 12 美元(占 10%)。而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甚至以 9.6 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 1% 至 2%。

国际分工收益的恶化导致出口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劳动力的实际收益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生存质量与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 年之前的 12 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 68 元。当时东莞市劳动局同意调高工资,但认为调整幅度不能太大,最好不要超过每月 480 元(东莞当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仅仅为 450 元)。^①即便是通货膨胀开始严重显现的 2009 年,工人的收入(包括加班)平均为每月只能达到 1000 元~1200 元,甚至有的工人说自己一年下来根本就存不到什么钱,等于白干一年。^②不仅收入水平低下,简陋、缺乏安全设施的工作环境,超长时间的工作、缺乏必要的培训,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中国每年有 15000 人死于工伤事故,^③仅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拥有上百万农民工的珠三角地区,每年至少有 30000 起工伤事故发生。1998 年鉴定的工伤(仅外伤)为 12189 例,其中 90% 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深圳平均每天有 31 人工伤致残,每 4 天就有 1 个人因工伤死亡。^④富士康“N 连跳”事件折射了中国制造工厂中劳动者的悲剧化境遇。劳动者收入低下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抑制了内需的扩张。

① 《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中国青年报》,2005 年 1 月 1 日。

② 《2008 年~2009 年珠江三角洲工伤调查报告》,网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7df4a90100hg9t.html。

③ 李强:《珠江三角洲工伤事故调查报告》,中国劳工观察,2005 年 9 月。

④ 《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中国青年报》,2005 年 1 月 1 日。

无论是投资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还是出口引致投资而更深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扭曲、过度投资、高资源投入和高消耗的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环境的高度污染,形成了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的“悲剧化”结果。2006年,中国投资于污染密集行业的企业数达50%以上,从总资产上来看,则有近2/3的企业投资于污染密集行业,而外商投资企业中有44%投资于污染密集行业。^① 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时尚污染——两个中国纺织专业镇环境调查》报告(2010年11月30日)指出,中国著名的“世界牛仔裤之都”新塘镇和“内衣镇”谷饶存在严重环境污染,经检测,两地部分地表水和底泥样本有重金属超标现象。该污染会毒害神经、会使内分泌紊乱,并导致癌变等悲剧的发生。2011年8月31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友科技、南京绿石五家环保组织共同发布调查报告——《苹果的另一面2——污染在幕后蔓延》,公布了一份苹果公司在中国供应链的污染地图,曝光了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直指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存在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指出“苹果”时尚产品的背后,是以“毒害环境、伤害社区、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② 再如煤炭出口占全国50%的资源大省山西,2005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8.41%,以煤炭、焦化、电力、冶金、化工等为支柱的资源产业家族占工业增加值的89.32%。常年密集的煤炭开采不仅造成有害气体的排放、水资源枯竭,还造成采空塌陷地质灾害、矿难事故的频繁发生,煤炭储存、运输中也造成矸石堆积、粉尘污染。^③

在低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模式下,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研发与创新的动力及激励被抑制。主要从事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劳动加工环节的生产,使得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足。如调查显示虽然有80%以上的农民工表示“希望得到职业培训的机会”,有6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花钱参加自己想要的培训”,但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8.6%。^④ 由于高素质人才得不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

② <http://business.sohu.com/20110912/n319100806.shtml>。

③ 史小芳:《山西煤炭出口贸易经济效益分析》,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8。

④ 原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31-36。

到合理的工资收入,使得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被抑制。与此同时,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失海外,以至于有人说“清华、北大是美国的预科”。据数据显示,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公费、自费等各类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39万人,其中仍然留在海外的有近100万人,只有39万人归国,回国率仅为28%。^① 中国企业通过低成本投入和简单模仿即可以获得加工贸易和低技术产品价格优势,因而不再有研发和创新的动力,导致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始终不高,产业调整和升级步履缓慢。虽然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已经相当高,但剔除加工贸易因素后,却无证据表明中国的出口品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②

上述种种问题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实现了速度的赶超和规模上的飞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但是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却难以持续,无法实现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社会的“共富”。

相较而言,一度同样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量”和“质”的飞跃,完成了经济的赶超,并成功地向发达国家收敛。

三、工业化战略、政府干预与经济赶超

同样遵循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为什么“亚洲四小龙”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收敛,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国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为何至今未能成功呢?

一般认为,由于市场不完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等因素,发展中国家完全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更难以实现追赶先进国家的目标,因而需要政府部分地参与,推进增长。

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与国际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拉美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广泛运用贸易壁垒

① 滕飞:《谨防金融危机下加重对外技术依赖》,《学习时报》,2009年4月20日,第4版。

② Alliti, M. & C. Freund. 2008, *The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628,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radeTeam.

保护国内比较劣势产业(未来可能是比较优势产业)免受进口竞争,由此促进比较劣势产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以东亚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强调打破价格扭曲,按照比较优势分工生产,通过促进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尽管大量的经验研究指出外向型战略(比较优势战略)与高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①但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直接。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了选择外向型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把自身永远锁定在了初级产品专业化分工上,比如非洲一些出口资源类产品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同样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四小龙”却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进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作为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典范,甚至有学者认为“东亚四小龙”的成功推翻了外向型战略将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低技术产业上的传统观点。^②

那么,东亚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性呢?以韩国为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使我们不能妄加定论。首先,韩国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之前曾一度推行过进口替代战略^③,因而韩国的成功也许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进口替代阶段的发展;其次,即便是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时期,韩国也并非完全没有政府干预,而存在着种种鼓励出口措施(张夏准,2007),这些措施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比较优势战略保持市场机制完善的初衷,但是却成功地助推了工业化的进程。韩国的经验至少表明,比较优势战略本身并不意味着经济收敛,比较优势战略与经济收敛之间必定有赖于某种机制。事实上,每一个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在其制度和经济特征方面都经历着独有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与经济收敛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是有些互动是良性的,而有些互动不幸走向了初衷的对立面。

① Balassa, B. 1986, *Toward renewe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28: 29-31.

② Krueger, Anne O. 1997,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We Lear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③ Singer and Ansari. 1998,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Disorder*.

四、创新、适宜制度与经济收敛

Gerschenkron(1962)认为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在引入适宜制度(appropriate institutions)的情况下,能够更快地赶上更发达的国家,虽然这种适宜制度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能够促进增长但在后期可能不会促进增长。基于适宜制度的思想,Acemoglu、Aghion 和 Zilibotti(2006)认为日本和韩国曾经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其虽然迥然不同于美国但却是适合日韩的制度安排有关:诸如企业和银行的长期关系、大型企业集团占主导地位和政府通过鼓励出口以及对制造业进行补贴对经济进行强势干预等。当日本和韩国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以后,这些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有限了。

Acemoglu、Aghion 和 Zilibotti(2006)关于适宜制度的模型建立在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以及沿着这一思想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上。熊彼特(1942)认为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整个经济结构革命化、它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事实”。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对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具有重大影响。Aghion 和 Howitt(1992)开创性地构建了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增长模型,刻画技术和产品之间存在着创造性破坏效应的增长过程,并奠定了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基础。在该模型中,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相互竞争的企业最优研发水平,一旦某个企业获得研发成功则获得一定的垄断地位,可以独立地定价从而获得垄断利润。但是这种垄断利润是建立在对上一期的垄断利润的“破坏”基础之上的,因此,企业在进行研发时会考虑潜在的竞争对手创新成功可能带来的影响。企业最优创新活动的努力程度和研发投入水平决定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速度。

Aghion、Howitt 和 Mayer-foulkes(2005)在熊彼特多部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后进国家通过技术扩散向先进国家收敛的模型。研发投资、教育、对新知识的开放等因素是决定落后国家的学习能力、追赶能力的关键因素。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技术扩散不仅可以在静态意义上提高本国的技术

存量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改善本国的技术能力,在动态意义上还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是当市场不完善时,尤其是后发国家由于市场不完善、政府管制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扭曲会影响技术创新的均衡,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Aghion(2005)把制度因素纳入到熊彼特增长的框架中。指出在全球经济中,一个国家不可能孤立的增长,而是在相互的影响中增长,一国的制度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并决定着技术落后的国家能否收敛到技术的前沿。Acemoglu、Aghion 和 Zilibotti(2006)指出非技术领先国家的生产者有两种方式提高生产率,一种是模仿已经存在的世界技术前沿,另一种是在当前技术的基础上投入研发进行创新。当一国与世界前沿技术差距较大时,模仿更有利于技术升级,而当与世界技术前沿差距较小时,则创新更有利于技术进步。一国的适宜制度指的是激励最有效的技术升级方式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模型,落后国家只有先采取模仿的技术升级方式,而后成功转型为创新的技术升级方式,才有可能向前沿技术(发达国家)收敛。因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所以实现了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和向发达国家收敛,是因为它们在各个阶段采取了适宜的制度,而中国未能实现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可能是因为中国实行的并非“适宜”制度。那么,中国的制度环境是什么呢?

五、体制性扭曲:中国的“超比较优势战略”

经济扭曲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验。根据形成的原因不同,经济扭曲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自由放任政策下由于市场发育不足表现出的扭曲,称之为内生性扭曲。另一种是国家政策带来的扭曲,称之为政策性扭曲。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扭曲除了内生性扭曲、政策性扭曲,还有与经济体制转型有关的市场扭曲,我们称之为体制性扭曲,即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着资源配置的角色,如由于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致使在要素领域,政府仍然是重要的配置主体,拥有规则制定权、执行权以及裁判权,直接参与要素资源的价格干预和配置,严重破

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中国模式,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看,是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外向型增长模式。一方面,通过高投资、高消耗促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就业与生产的扩张。

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特征可以从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科技进步的粗放型增长中体现。首先,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生产方面,资本要素投入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平均贡献在1979~1997年达45.4%,是拉动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加上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14.8%,要素投入贡献相比于科技和效率进步带来的贡献(37.8%),占据了绝对主要的地位。刘遵义等(1994)发现中国1992年前资本贡献率达92.2%,劳动贡献率9.2%,而表示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4%。^①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趋势维持不变。与日本、“东亚四小龙”的高资本投入模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资本投入呈现出粗放型特征:第一,政府在投资中起主导作用,私人部门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对于重工业的投入过高,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投资更多地表现为简单的数量扩张,而不是对提高效率的投入。第三,一些产能落后、生产效率低的市场主体也跻身投资主体之列,而一些创新能力强、生产结构较优的市场主体却被排除在外。

其次,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的依赖过大。1979年,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为58,588万吨标准煤,2000年这一数值上升到138,553万吨,增加了136.49%。《2010世界新兴产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万元GDP能耗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约6倍,也高于印度、南非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源与能源高消耗的同时,利用效率始终很低。这一方面扩大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资源缺口,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自然延续到了出口部门,表现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这种低成本不仅包含了由中国人口禀赋自然形成的低廉劳动力投入,也包含了与出口产品粗放型生产相关的低廉的资源使用价格,劳工标准降低带来的成本节约,环境破坏的成本以及政府提供的

^① 克鲁格曼(1994)引用该研究的结论,预言了亚洲经济危机。